



沸騰的村庄

谷斯范 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沸騰的村庄

谷斯范 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共收入篇散文特写。《沸腾的村庄》、《老人和灵芝草》、《在五洞闸》、《阿祥老头》四篇，描绘了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，浙东地区农村里所涌现的一些动人的新人新事和惊人的奇迹。《不寻常的夜晚》描写上海郊区农村里，个别富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的錯誤道路，遭到了广大农民的有力的批判。《雨天》描绘了生产大跃进中，农村里干部和群众轰轰烈烈的干劲。《觉醒》写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老工人，从解放初期对党和政府怀疑和不信任，经过事实的教育，树立了爱国主义的正确立场。《渡》是一篇描写朝鲜人民艰苦斗争的故事。

沸 騰 的 村 庄

谷 斯 范 著

*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719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字数 55,000

1958年7月第1版

195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,000 定价 (6) 0.26元

目 次

沸騰的村庄·····	1
老人和灵芝草·····	10
在五洞閘·····	17
不尋常的夜晚·····	24
阿祥老头·····	36
雨天·····	52
覺醒·····	61
渡·····	81

沸騰的村庄

傍晚，会稽山脉遙远的叢嶺，蒙在一片紫色的夜霧里。天空，碎錦似的，撒着鮮紅的晚霞。

“过石桥便到村啦！”郑彬生指着远处一座大桥說。

这位四十出零、瘦長、干練的火炬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長，我們今天在区委会才認識。区委書記說，他們村里冬季备耕工作搞得熱鬧，全乡积肥竞赛，已連得兩次优胜紅旗。我就趁他回村的方便，跟着来看看。一路上，郑彬生很少談到个人的过去，只簡單地告訴我，他小时是个孤儿，父亲患羊癲病，討飯死在外乡，不久母亲嫁了人，他没依沒靠，九岁就給地主看牛。对村里的情况也談得不多，只說全村二百六十七戶，以前是三个初級社，上月份才轉成高級社，現在村里已沒一个單干戶。他談得最多的，是关于推广連作稻的事情。

“桥那边全是社里的田，”他嘮嘮嘴說，“一千三百亩，准备都种連作稻。”

“去年种了多少亩連作稻？”

“九亩七。”他朝我笑笑說，“你感到奇怪嗎？跟过去比，这算是不小的数目。一九五一年，紹兴全县只种六亩連

作稻。以后逐年推广，到去年，种上了一万三千亩。今年，全县的初步规划，要种二十万亩。我看，结果会远远超过的。以我们社来说，已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耕地，种上了连作稻。”

他告诉我：种连作稻是争取大面积丰收的关键，是一场艰苦的斗争。去年，社里只种九亩七分，已遭到激烈的反对，有的说：“种连作稻象翻牌九，翻进翻不进都靠天。”有的说：“种连作稻，劳力多，肥料多，虫害多，自讨苦吃。”

“要不是毛主席指明方向，全国掀起社会主义革命高潮，”郑彬生望着快要走近的石桥，激动地说，“照以前的情况，莫说种一千三百亩，想种一百三十亩也难如上天！要打破保守思想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就订指标的事来说吧，去年我们低级社稻谷生产指标，订的是每亩平均六百八十斤，社外单干户嘲笑说：‘六百八，好大的胃口！瞧你们社员家家住瓦房，人人穿皮鞋吧。我们不巴望别的，只想讨双破皮鞋穿穿。’社员中头脑陈旧的，也嚷嚷说：‘什么指标不指标，讲空话，白搭！亲眼看见，亲手摸到，才货真价实！’……”

一群黄绒毛的小鹅，争先恐后，沿油菜田的沟边过来，啃着路旁碧绿的草芽。郑彬生站住步，蹲下身细细瞧，问赶鹅的小孩：是社里副业还是自家养？哪儿买？什么价钱？小鹅“格格”叫着过去了，郑彬生想起刚才话还没说完，接着说：

“社里有个朱小保老头，公开在社员大会上说：‘能否实现指标，要看老天爷答应不答应！’别人责问他：‘老天爷不答应便怎的？’‘不答应嘛，’他慢吞慢吞回答，‘罗底放几个

爛泥块，跟稻谷一道秤，也能湊滿六百八十斤！’到秋收，我們社里稻谷每亩平均收七百二十斤，超过指标四十斤，比單干戶每亩多一、二百斤。算是讓他們‘亲眼看見，亲手摸到’了，这才服服帖帖。今年轉高級社，稻谷生产指标訂每亩平均一千二百斤，一千二百斤！”他重复着說，黑黑的瘦長臉上，露着庄严的、胜利的笑容。“这数目呀，莫說祖先做夢沒想到过，我們干部自己吧，一年前，也決不敢朝千斤以外想。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指示，象孙悟空手里的金棒，把一切保守思想的妖魔鬼怪赶跑了！指标提到社員大会討論，誰也不反对，都說：‘轉了高級社，种上一千三百亩連作稻，指标能达到。’連作稻的优越性，他們也已‘亲眼看見，亲手摸到，’社里的九亩七，因缺乏經驗，遭了虫害，收获仍比鄰近田里多出几十斤；而紹兴全县的‘千斤田’，十有九种的是連作稻。会場上，有人故意‘將’朱小保的‘軍’：‘老伯，訂了一千二百斤的指标，要不要等老天爷的批准？’那老头紅紅臉，干脆說：‘干老天爷屁事！能否实现指标，要問自己十只手指头！’……”

郑彬生笑起来，笑得那么乐。

“老头的靠天思想，算是打破啦，”他接着說，“但没有認識实现一千二百斤指标的艰苦性。光凭十只手指头，干不了这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还得充分發揮高級社的优越性，挖掘妇女劳动潛力，保証做到每亩捻河泥三百担，深耕細作，采用双輪双铧犁、抽水机等新式农具……”

我們走上石桥。河水被东北风吹起波浪，“汨汨”响

着。桥边是座凉亭，神龕空空的，殿里堆着水車、車盤，橫匾上貼着紅紙，写着“快馬加鞭，奔向社会主义”几个大字。离凉亭不远处，歇着一条捻泥船，四、五个妇女赤着脚在盤泥。

“老郑，回来啦？”

“阿凤嫂，有事呢！”郑彬生招招手。

跑来个中年妇女，梳着头髻，高高的身材，穿藍条格子布棉襖，系了块满是泥漿的腰圍。这是他們的妇女副社長徐阿凤。

“你准备一下，”郑彬生說，“去参加县里开办的連作稻訓練班，后天中午报到，時間是十天。”

“啊呀，十天？”徐阿凤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尖声叫起来，“托儿所、扫盲、妇女积肥評分、宣傳消灭釘螺絲……事情一大攤，我抽不得身！”

“县里規定，乡支書、高級社社長、妇女副社長，必須参加。”

“柴爿，能一斧头劈成兩爿，看来，要把我劈成兩爿才行……”

她咕嚕着，又去盤泥了。

夜色更濃。在这河港交叉的平原上，已辨不出哪儿是麦田，哪儿是油菜田、蚕豆田。田畝上忙碌了一天的人們，結队往村里走。一群年輕姑娘，挑着畚箕，以清脆的嗓音唱着：

一根毛竹节节高，

篾匠师父手段巧；
畚箕来打好，
忙把河泥挑，
提高产量先要积肥料。
噯唷哟噯唷，噯唷噯噯唷……

“她们是青年突击队員，”郑彬生对我說，“这群年輕人可了不起，不論多劳累，总是嘻嘻哈哈的，天塌下来，也頂得住！”

村口，會計爬在桥边老柳树上，用土广播报告今天妇女和儿童的积肥数字。晒場上，几个頑皮孩子敲着鑼鼓。

“靜一靜，小鬼！”會計在广播筒里罵。

我們剛上桥，傳來惊慌的、孩子嗓音的尖喊：

“社長！”

一溜烟，那几个敲鑼鼓的，逃个精光。

农业社的办公室，設在朱姓祠堂內。屋里点着盞煤油灯，戴黑氈帽、眼眶深凹、上了年紀的生产委員，撥着算盤珠，查看十天来的捻河泥数字。全乡积肥竞赛，主要是比河泥的数量和質量，要求在春耕前，每亩田都捻足河泥三百担。每一个小段計劃告結束，評比一次。火炬社已連得兩次优胜紅旗。今晚，生产委員、會計、各生产隊長，正准备要到乡里去参加第三次評比。挂在办公室壁上，一面綉着“积肥先鋒”黑字的紅緞錦旗，是各社爭夺目标，全乡年輕人心

眼中的“宝中宝”，今晚也得帶到會場上去。進辦公室來的，都為它担上一分心事：

“保得住嗎？”

“能！”團支書朱彰順回答。

“彰順，”鄭彬生插嘴問，“你怎知一定能保得住？”

“社里十三條船捻河泥，起早摸黑，從沒閑過。”

“別社的難道閑着？”

“我們社員的社會主義熱情高！”

“別人也在往社會主義道上奔，沒半路睡覺。”

朱彰順答不上，圓圓的、胖胖的臉上，露着尷尬神氣。兩手插進棉布人民裝口袋，一動不動。過了會兒，笑笑說：

“連中三元，沒問題！”

“自信是重要的，”鄭彬生以誠懇的語調說，“但要隨時檢查有沒有自滿情緒？達到一千二百斤指標，是一場艱苦的鬥爭，過五關斬六將，一關關闖過去，稍有自滿情緒，便會摔跤……”

“我敢保險！”會計提著廣播筒奔進來，“我們社沒自滿情緒！”

“你怎知道？”

“捻河泥，堆土肥，全鄉算我們數字高！”

“這就叫自滿情緒！”

鄭彬生的黑黑的瘦長臉上，眼光是嚴厲的。

會計碰了個沒趣，聳聳肩，回家吃晚飯去了。

晚飯後，民校的每個教室點起汽油燈，鬧鬧哄哄，擠了

几百人。自从“十七条”传达后，村里的扫盲工作就搞得起勁，學員們都訂了保証，哪怕有病有痛，也尽可能不缺課。社务委員中有几个在扫盲班学习，所以原定晚上开的社务委員會，要等民校散了学，才开得成。郑彬生和徐阿凤，做了几年村干部，学会上千字，沒进民校，两个抽这空闲，在办公室談工作。徐阿凤穿着藍条格子布棉襖，一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她靠煤油灯坐下，一边談，一边給孩子納鞋底。

“你走前，开个妇女干部会，”郑彬生說，“做好思想动员工作，靠男劳动力，无法种一千三百亩連作稻，今年年輕妇女都要下田。”

“有的怕螞蝗咬呢……”

“螞蝗？”郑彬生笑起来。

“小棵密植，橫三豎六，啊呀，可不簡單哪！”

“那没什么，誰都不是生下地就会种連作稻的。我們从县里学习回来，抽一百个男劳动力、五十个女劳动力做骨干，摆螺蛳壳，教会他們。”

“也教十天？”

“不！三天够啦。”停了停，郑彬生又說，“实现‘四十条’，要做的事情一大攤，任务工作能抓紧，就抓紧，慢吞慢吞，那不行！托儿所的事，你也必須在走前料理好，彻底解放妇女劳动力，办好托儿所是个关键。”

談到托儿所，女副社長停下手里納着的鞋底，呆呆望着灯火。好一会儿，才說：

“扩大托儿所，至少得添七个保育員。”

“人选决定了没有？”

“对象有三个：阿元媽媽，三叔婆，祝家外婆。跟阿元媽媽只談了一次話，她滿口答应，說她跟社是一條心，社叫她干啥就干啥。”

“啊，了不起！”

郑彬生感动地点点头，回身对我說：

“阿元媽媽五十八啦，起五更，落半夜，扫場，挖阴溝，燒焦泥，独个儿积了三百五十担土肥，是我們社里的妇女积肥模范。——三叔婆态度怎样？”

“三叔婆起初借些話推托，說人吃点苦不要紧，耳朵可吃不起苦，干了保育員，听的閑言閑語多。为了說服她，我談了办好托儿所，对实现指标所起的作用，談了‘四十条’的‘五保’，又拿穷村比富村的实际例子，来了个对比。她想起年輕时，到青黃不接，出外討飯所过的苦日子，哭啦，說：‘阿凤嫂，人心是肉做的，不是木头雕的，保育員中，把我也算上一个！’眼前只祝家外婆沒完全决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說年紀靠六十边，怕不中用。”

“中用！三年前，她还到杭州灵隐寺拜过佛，把‘朝山进香’的勁道用出来，就能做个出色的保育員。——这样吧，你明天开个老太婆会，請阿元媽媽典型发言，提高提高老太婆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添七个保育員的任务，才能一次完成。”他迟疑了一下，帶点責备口吻說：

“工作得抓紧做，慢吞慢吞，那不行！”

徐阿凤微微漲紅了臉，咕嚕說：

“事情一大攤呀！人不是柴爿，能一爿劈成兩爿……”

這夜晚，社務委員會討論小段計劃，過十點鐘，會還沒散。我白天跑多了路，感到疲倦，往祠堂後進的側屋去睡。不久，被土廣播的喊聲惊醒：

“全體青年突擊隊員，緊急集合！緊急集合！……”

我不知出了什麼事，穿衣起來。天井里一片好月色，寒冷的夜風，吹得人直打哆嗦。辦公室燈還亮着，人聲亂嘈嘈的，戴黑氈帽、眼眶深凹、上了年紀的生產委員，一臉委屈，正在向社務委員們報告評比落選的經過：鄰近一個高級社，動腦筋找肥源，在四十多里路外尋到個死港，堵起水壩，出動一部抽水機，十多部水車，車干死港的水；結果得到的河泥，質量好，數量又多，全鄉“積肥先鋒”的紅旗，落入他們手里了。

青年突擊隊員們在民校開會，我跑去看，課室里點着汽油燈，人擠得密密的，有的為了失去紅旗，傷心得流眼淚。團支書朱彰順激動得象剛打過架，站在講台後，一邊喘氣，一邊晃晃拳頭，啞着嗓子喊：

“我們立刻向社委會建議：第一，專門派人找肥源，哪怕百里路遠，也得裝回來。第二，撿河泥加夜班，由我們突擊隊員包干，民校散課後出發，過半夜回村……”

他們的建議被社務委員會接受了。就在這夜，月光下，十三條撿泥船一齊出動，岸上年輕人的歡呼聲，跟河港里的“欸呀”搖櫓聲，響成一片……

老人和灵芝草

还未到船埠边，就傳來“嗚嗚”的海螺声。

海螺声引起了我的早年的记忆。搭航班船，曾是我少年时代很感兴趣的事，你可以遇見各式各样的人，他們經歷着不同生活，有不同的喜愛和偏見；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故事，快活的或悲慘的，严肃的或荒唐的，有的甚至帶有引人入胜的傳奇性。而船舷外江南水乡的景物，也够吸引人：光滑透亮的河面，拍着翅膀“呷呷”叫着的鴨群，秋天兩岸烏桕树的紅葉，春天濃酒般醉人的油菜花香，……这些景物，不論時間隔得多久，常一閉眼就能想起。

这次到农村體驗生活，使我又有机会搭上航班船。時間的变化，时代的脚印，也留在这小小船上。船已参加公私合营的联运機構，艙板拖洗得出奇地干淨，竹壳船篷上挂着“乘客意見簿”，貼着“服务公約”。乘客中有四个年輕人，是几个高級农业合作社的畜牧組長，剛在县里結束了飼养員短訓班的学习。其中有一个是女的，帶着喂奶的孩子和一大包尿布片。他們一会儿玩着扑克，一会儿起勁地談着猪丹毒、双配繁殖法，或是爭着卷心菜和胡萝卜的营养成份那个好的問題。一个戴烏氈帽的老人，不爱說話，乘客少，他

就閉着眼，躺在船艙里。有一位老婆婆，患着腎臟病，臉又黃又腫，一路饒着舌，怨船慢：

“老大，你們沒吃飽飯嗎？……”

三个船老大，为了执行“服务公約”，沒答理。

我感到船艙里悶气，爬到船头，看兩岸的景物。一片碧綠的麦苗，青翠的竹林，包着新芽的柳枝，在初春的太阳下，显得生气焕发。河岸边的凉亭白壁上，斗大的黑字，写着“保証每亩捻河泥三百担”，或是“再加一把力，实现千斤乡”。田畝上，人們为迎接建高級社的第一年，为創造丰产的奇迹，正在緊張地劳动。有时，一陣敲鑼打鼓，一群男女举着生产竞赛中获得的紅旗，繞着麦田走，回自己社里去。……

“老伯，哪里能弄到灵芝草？”

那患病老婆婆的奇怪念头，把我的注意力引回船艙里。

“四川峨嵋山。”戴烏氈帽的老人想了想，回答。

“灵芝草能医腰子病吧？”

“仙草嘛，能医百病。”

“富根老头吃了灵芝草，躺了一年多的重病就医好啦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誰哄你，有人亲眼看見……”

船后梢傳來哈哈笑声。一个瘦削臉的船老大，笑得搖不动橹，干脆坐着喘气。

“短命的，笑什么？”老婆婆罵。

“笑富根老头吃灵芝草……”

“真有这回事嗎？”女畜牧組長好奇地插嘴問。

那瘦削臉的船老大，跟富根老头是同村人，他盛了一大碗冷飯，進艙來，一邊吃，一邊告訴我們這故事的始末。

富根老头今年七十三，老伴早過世，沒兒沒女，患病躺倒後，全靠侄兒、侄媳婦服侍。富根老头就為這感到心情沉重，覺得對不起後一輩，常怨着：

“活着干啥？反而多受罪……”

去年入冬後，病更沉重，連端把竹椅，到草屋前晒晒太陽都沒勁，整天躺在床上。他侄兒夫妻倆，一個是社務委員，一個是生產小組長，忙着轉高級社，搞冬耕積肥，整天不在家，老人全仗十二歲的侄孫女阿菊照料。到舊曆年底，轉高級社得到區上批准，全村三個初級社和一些單干戶，組成一個社，於是，白天黑夜，村里不斷聽到鑼鼓聲。老人寂寞、空虛的心，漸漸被鑼鼓聲驚醒了。

“阿菊，什麼事呀？”

“爷爷，我們辦高級社啦！”

“哦！”他感到輕快得多。富根老头病倒前，村里還沒有初級社，那時談到社會主義，他總是摸摸白胡須，怀着羨慕的心情說：

“年輕人，那是你們的啦！”

沒想到，一霎眼，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就出現在眼前。躺在病床上，一邊听着歡樂的鑼鼓聲，一邊聯想起自己在眼淚中消磨的大半輩子，想起十多年前過世的老伴，不覺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：要親眼看看大伙的好日子，親眼看

看社会主义。

旧历正月初十那天，开庆祝高级社成立大会。前一晚，锣鼓整整敲了一夜，全村居民四更起身烧饭吃，男女老小都换穿了新衣去参加庆祝会。阿菊帮娘烧好饭，自己换上红花布新棉襖裤，辫上系了红绸结，打扮得整整齐齐，然后端着火油灯，送饭汤到富根老头房里去。

“啊！”她失声惊叫。

阿菊她娘以为是老人过了世。急急奔进来，见富根老头旧棉襖外罩上留着做寿老友的新蓝布褂，戴上乌氈帽，穿上鞋袜，坐在床沿。

“爷爷，你起床干什么？”侄媳妇好心地责备他。

“这村我住了一辈子，”富根老头摸摸白胡须说，“今天是大喜日，怎能不去看看？”

“受了凉，怎么办呀？”

“受凉嘛，喝碗姜汤发发汗。”

“阿菊她爹，”她没办法，喊，“你来劝劝！”

她丈夫帮着劝了一番，没用处。叫他坐在竹椅上，抬着走，也不依。天大亮后，富根老头拄着手杖，由阿菊扶着，参加庆祝大会去了。

出门才转个弯，到河岸边，前面直溜溜一条崭新石板路。富根老头疑心自己花了眼睛。

“阿菊，哪来的石板路呀？”

“这叫‘社会主义青年路’，全村青年突击队员，做的义务劳动工。”